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学术丛书

王汝澜 等 编译

域外民俗学鉴要



宁夏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学术丛书

域外民俗学鉴要

王汝澜 等 编译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学术丛书编委会

名誉主编：冯骥才

主　　编：白庚胜

副 主 编：向云驹　黄美荣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雪松　王锦强　王端阳　白庚胜　白旭旻

冯　莉　向云驹　刘晓路　刘蕴杰　刘绍振

朱芹勤　李亚沙　吴　薇　高育武　黄美荣

黄凤兰　谢桂华

序言

钟敬文

近几年来，我们国家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或者说，在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到达了一个新的起点。在学术方面，不仅那些跟物质生产直接相关联的科学、技术有较大的跃进，就是一般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也如春汛秋潮，呈现汹涌澎湃的气势。特别是那些多年来被冷落了的学科，一时从冬眠里苏醒过来，生意蓬勃，气象万千，预示着绮丽的前途。民俗科学（包括民俗理论、民俗史、民俗资料学及方法论等）的重兴情况，就是一个显著例子。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不但历史漫长，开化较早，在各种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还留下了丰饶的资产。就民俗学方面看，秦汉以前，就有某些资料记录和断片见解。东汉以来，不但已经有资料的专集（如《风土记》等），而且也出现了专门谈论的著作（如《风俗通义》等）。这方面的著述，唐宋以后就更多了。这可说是我国民俗学的“史前史”和“原史”。但论到比较严密的科学活动的成果，却应该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时算起。1917年，《新青年》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并刊载了破除传统格律的白话诗。这在我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是一件大事！第二年春，北京大学文科的进步教授们创立“歌谣征集处”，接着就在《北大日刊》上刊出歌谣（包括一部分谚语）。1922年冬，北大歌谣研究会（由征集处发展而成的）创办了《歌谣》周刊。在其《发刊词》上明确指出，搜集民间歌谣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民俗学研究（另外一个目的是文艺的研究）。从那时起，“民俗学”这个名词，便在新学界里迅速传播开来，并且对此后的民间文学及一般民俗资料的搜集和探讨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点，我们现在只要翻检一下那个时期各地出版物的记

载和评论文章,就可以了然于胸。

从那个时期到全国解放前夜,二十多年间,由于社会的变动,民俗科学经历着曲折、分化的过程。但从总体看来,它是在不断发展。这不仅在建立了民主政权的北方是如此,即在国统区也大略如此(由于当时的一些学术机构被迫迁移到少数民族地区和抗战情势下的政治需要等原因)。从学术的指导思想看,国统区当时的民俗学活动,主要仍是西方学术观点的运用。不过,从当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说,他们这种学术的倾向,基本上并不背离整个文化活动的性质,即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那三个特性。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这是在我们广阔的土地上,自原始社会消亡以后,史无前例的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不但政治、经济等具有空前的民主性,一切的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同样具有过去长期阶级社会里所不能有的广泛民主性。但是,历史的发展道路,往往不是单纯的直线的。好像在和暖的春天里,有时不免突然刮大风,或者某些角落里还余留着残雪。民俗学等学科在解放后的一段时期里的遭遇、不幸正类似这种情形。

在那个时期里,民俗学的某些方面曾经受到重视,如对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的搜集、探索。(这点,要大大感谢从延安时期所形成的新传统!)又如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由于被作为民族的社会历史资料,也对它进行了广泛的搜集(但当时没有给以发表)。尽管有这些可喜的事实,但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民俗学不管在公家的大学、研究所中或私人的书斋中,都没有得到一定的位置。这是一次学术历史上的误会!

民俗现象,主要是广大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历程中为了满足生活的各种需要而创造出来,并不断加以修缮、丰富而发展过来的民族文化总

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体的一部分。它深印着广大人民的足迹,凝聚着他们的智慧和才能。它是普通文献所缺少的历史的珍贵资料。从今天我们的现实生活去看,在这传统的社会文化仓库中尽管有些东西已经过时,甚至成为毒害,但这资料并不妨碍到它作为民族文化史和文化学研究的价值。即使仅从今天创造新文化的角度看,或者说从“应用的民俗学”的角度看,为了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它要求我们慎重地考察长期流传下来的不少还具有生气和活力的民族风俗文化财富,并加以选择和改造,使之继续存活下去。至于那些实在与我们民族新文化性质敌对的不能容忍的,就应加以剔除——把它送入历史博物馆里去。

民俗学主要是研究民族的人民的文化传统的科学,尽管在它的兴起时期,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在治理殖民地的行政中曾经利用过它。有些学者也在自己著作的序言或导论里指出了这点,像我们过去学界所熟悉的英国《民俗学手册》的改编者C·S·班女士。但这不是普遍的现象,因为民俗学作为一种学科,它的搜集范围、研究范围一般限于本国。而且不少是把它作为民族自我认识或振奋民族精神的武器看待的。这种事实,是稍为涉猎东西民俗学科历史的同志都知道的,并不是需要我们费力去探索的学术秘密。

总之,民俗学这种学科,在我们这样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是理应得到发展的(自然,它像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应该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去考察和处理)。但是,过去一个时期中,它却受到冷遇。原因很明显,主要是由于那种“左”的领导思想在作怪。这只要看当时民俗学的一些姊妹科学如民族学、社会学等的同样遭遇就十分明白了。其次,是我曾经一再指出的,过去,我们在对待学术的问题上,片面地理解和因袭了苏联(包括俄国)的学科结构,而忽视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和本国这方面学术的历史传统。其实,苏联虽然把“民俗学”(Folklore)这个世界性术语在使用上一般限于“人民创作”或“人民创

作学”的范围中，但他们学界并不是没有关于民俗现象的搜集、探究活动，不过大都把它归属到“民族志学”（或译“民族学”）的范围里去罢了。这里面当然还夹杂着一个使人感到烦恼的名实问题和术语移译中的民族差异问题在内。解放后，我们既把“民间创作”代替了全面的民族现象，又没有更好地发展“民族志学”这类学问，结果就当然把应该发展的民俗科学抹煞了。如果不是经过1976年的拨乱反正，接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把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正式列入此后全国科学研究的范围，恐怕民俗学等的学术地位到现在还不免像旧社会里的“堕民”那样没有“公民资格”呢！

我们今天重新提起这些，决不是想清算历史的旧账。主要是在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这是何等痛苦的经验、教训！），使未来的学术进程中减少不必要的周折和牺牲。

前面提到过，拨乱反正以来，我们的民俗学有了蓬勃的生长气势。这种气势，不是亲眼看到、亲身经历过的人，差不多有点难以相信。为了唤起大家的注意，为了给我们的科学史留下点记录痕迹，更为了促进大好形势的向前发展，让我在这里把它举述一下吧。

首先，是民俗学各层次机构的建立。

自80年代开始以来，短短几年内，从北到南，从中央到地方，已建立起中央级和省市级的民俗学会。省级民俗学会，辽宁成立最早（1981），接下来是吉林、浙江。江苏、广东等省是去年秋冬间成立的。今年，大概尚有一些省份（如河南、陕西、广西、云南等）将要追赶上来，而安徽省已经走在了它们的前面。中央的民俗学会，则建立于1983年夏。省级以下有些县、市、专区也成立了这种机构，如广东的梅县、湘南的湘潭等。民俗学现在不仅在社会上流行，它已经进入了南北各大学。像辽宁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云南大学及中央民院、西南民院、上海师院、牡丹江师院都先后开设了这方面的讲座。

据说，听讲学生相当踊跃，特别是外国留学生更感兴趣。大学里不但设有这方面的讲座，而且成立了民俗学社，如辽宁大学、复旦大学、河南大学及中央民院都已经出现这种组织。北京大学、中央民院还成立了校一级的民俗学会。民俗学机构（包括讲座、学社等）的建立本身就标志着这门学科的发展情况，同时它又是推进这种发展的动力。

其次是这方面收集、研究与出版的兴旺。

几年来，民俗收集、整理和探究活动不断增长。这种活动及其成果，大都反映在各种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出品，大学里学生的毕业论文选题，各种期刊发表的文章及各出版社刊行的专著中。我们试举点例子。1981 年夏，辽宁民俗学会刚成立，在所开的学术讨论会中，就收到民俗学论文（内容主要是关于满族的）41 篇。第二年，浙江刚建立的民俗学会所开的讨论会，会员也提出了论文34篇。去年秋在扬州召开的江苏民俗学会，收到的论文共72篇，并且已经选印成书。又据一位从事人文科学年鉴编辑工作同志的不完全统计，去年一年中，各刊物所发表的关于民俗的文章近190 篇，其中就有120 篇是理论性的。近年来，学会、报刊等出现的民俗学文章有值得注意的一些特点，就是作者大多数是非专业的中、青年干部或教师、大学生等，内容所涉及的范围也很广。其中不少是资料性的，但理论探索的也不少，有的还达到一定的科学水平。这种现象，跟中国现在的国家性质、社会性质和这门科学因过去的遭遇而急需赶上等情况有关。

至于出版的专书（包括资料集及论文集），几年来约有30种。资料性的，如《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志》《布依族、苗族风土记稿》《侗乡风情录》《苗族风俗与风俗传说》《满族在岫岩》《浦江风俗志》《金华地方风俗志》《延安风土记》等；理论性的（包括历史论考的），如《民俗学论文选》（浙江省）《中国传统节日趣谈》《云南民俗（学）集刊》及《敦煌民俗学》（讲义本）等。除了新编选的著述外，近年还出版了一些

新校释、整理的古代风俗著作，如《山海经校注》《风俗通义校释》《东京梦华录注》及《燕京岁时记》等。又有一些有价值的民俗学著述，如宋人的《岁时广记》、近人的《北平风俗类征》等正在重新刊印中。此外，还有那些旧地方志风俗部分资料的辑集本，也在一些省份内部印行。

出版方面，除专书外，还有许多专业性的报刊。杂志如《民族文化》《山海经》《乡音》及《浙江民俗》（内部），小报如《采风》《乡土》《民俗报》等。这些报刊，大都拥有巨大的读者群，在普及民俗知识和推进采集活动等方面是有作用的。

近年来，这方面收集、研究和出版的兴旺，正预兆着一个更加灿烂的学术芳春时期。

再次，民俗知识的广泛传播和干部培训。

民俗学知识，在全国解放前就传播不广，解放后20年中，又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因此，传播这方面知识，是当前一项紧迫而又繁重的任务。几年来，各大学的讲座和各种形式的出版物，都在这方面作了一定的努力。但是，仅仅凭借这些渠道，还嫌不够，特别对于许多急迫参加这方面搜集整理和进行初步探讨的中青年同志，需要获得更加广泛和比较系统的专业知识。因此，许多有关机构（包括各省、市兼负有这方面职责的民间文艺研究会等），根据目前这种情况，开办了这方面的短期讲习班、训练班，招集学员，进行授课讲学，兼指导收集、整理实践。如1983年暑假，中国民俗学会就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关于民俗学及民间文艺学的讲习班，学员人数150余人。虽时间短，功课安排也未尽善，但由于符合客观的需要，以及学员们的努力，两年来在全国这门事业的推进上颇见功效。近年来，一些省市的有关机构也开办了这类讲习班，同样收到可喜的效果。事实证明，这是在我国现状下推广民俗学知识和扩大、加强专业队伍的有效办法。

此外，我国几年来民俗学的新活动项目可以记述的还不少，如博物

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馆中设置民俗展览部（有北京、天津等城市，而南通的这方面设置和活动尤进行得较早）。这种设置，不但将来应普及到各省、市、自治区，而且也应进一步普及到各县和乡镇。又如临时性的民俗物品展览近年时常出现，特别是关于民间工艺美术方面的，不但在各地举行，而且到首都来展出，有的还出国展览。它的影响颇大。这方面的同志正在积极筹建全国性的民间工艺美术博物馆。民间的美术和各种工艺品，是民族文化中极有价值的部分，同时也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眼前这种好势头，是非常有利于民俗学研究范围的展开和它的地位的提高的……

总之，几年来，我们的民俗学活动虽然有某些缺点（例如缺少统一的筹划、指导思想也不够明确和有力……），但是，气势的确是喜人的，成绩也是显著的。我们试把从“歌谣征集处”发端到现在我国民俗学的经历与成果看一看，不能不感叹历史真是在大大前进了！

现在，我们这门科学发展的脚步尽管是迅速的，但并不是说它的“功德”已经圆满了。正相反，还有更多的、更繁重的工作亟待我们去做（有的甚至于仅仅是在开始）。在这些待做工作中的一项，就是打开通向世界的窗口！这个世界上有着林林总总的许多国家、民族（特别是那些现代文化开辟比较早的国家、民族），他们在这方面的科学活动现在有哪些表现？特别是他们有什么新的理论或方法成果？……这是具有“面向世界”任务的我们所应急切想了解的。为了达到这一点，我们就有必要去放眼世界，去采撷那些各种颜色、各种香气的学术花朵和成果，以供观赏和以资参考。鲁迅所谓的“拿来主义”，就是首先要拿来，然后加以辨别、汲取的态度。这种做法，是符合于实事求是的原则的，也是符合于革命的科学的马列主义精神的。

对国外民俗学的科学成果及活动情况等的介绍，我国“五四”以后就已经开始。在我国这种学问的生长过程中，工作（前期主要是一般西方学术思想体系，后期主要是马列主义的）虽然有方向和程度等的区

别，但对于跟它各自相适应的时期的斯学的建立、发展上是起了不同程度的作用的。

现在，我国社会经济正在敞开大门，学术界也打破过去的那种闭关自守的做法。这对于提高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科学文化水平是必要的，对于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并进而发展马列主义，同样是必要的。

这本译文集就是在这样的理解下产生的。它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和推进具有民族的和时代的色彩的中国马列主义民俗学。对于世界新文化的态度，我们要学蜜蜂，采集的是各种花粉，而酿出的却是自己的蜜。

近年来，我国一些专业性的期刊在这方面作了一些介绍工作。这是有意义的和有效益的。可惜它们比较零碎，比较分散，不能使学习者感到满足。这本民俗学译文集，就企图在这方面初步作一些填补。但是，因为是杂志类的东西，也不能做到很完备或系统化。更重要的问题是由于一时手边资料的缺乏，所介绍的文章不免有些偏颇。例如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文章就很少。这种缺点，我们希望今后能够逐渐改进。

最后，我要声明一下，编译这本集子虽是由于我的倡议，但实际从事编译工作的却主要是王汝澜同志。她的辛勤劳动，我想读者是会默记在心的。

1985.6.13于北京

日本浅海地区的滩板捕捞民俗①

[日]小川博 著　　白庚胜 译

一、关于滩板捕捞

在日本海岸，有几个退潮时露出海底的浅水海域。这些海底堆积物构成呈软质泥状的区域，其中就有明海北部和因在1956年2月22日进行开拓而被淡水化了的儿岛湾。这两个地方有这样一种习俗：为了在退潮时捞取海滩上的水产物，捕捞者乘用一块长方形木板制成的滑行器，由单脚蹬蹴而通过泥滩。

二、滩板的型态（有明海型与儿岛湾型）

有明海的滩板与儿岛湾的滩板多少有些差别。有明海型滩板通常长六尺，宽一尺一，厚度仅有五分，尖顶部分被烘烤上翘，一般认为以硬木为佳，大多用一块杉木板制成。儿岛湾型滩板在整体上是长方形的，但尖顶并不曲翘，杉板长六七尺，宽一尺五，

① 本文选自西村朝日太郎古稀纪念论文集《历史的文化像》一书。文中资料大多为西村朝日太郎教授与小川博先生共同调查所得。在翻译过程中，曾就有关问题去函请教，得到西村先生和小川先生的热情指教，特在此表示衷心感谢——译注。

厚五分。它由两块杉板按纵向组合而成，底面凸出，比之有明海型实属大型。它因尖顶部分并不曲翘，故而不分前后。两块木板被船钉钉在一起之处颇具特色。据说，有明海一带的滩板主要由使用者亲自制成，在儿岛湾一带则由造船木匠制作而成；有明海的滩板往往因海滩的严重磨损而变薄折断，仅用一年，而在儿岛湾因海滩柔软，滩板可用很长时间，有的甚至可用五年左右。

三、滩板的使用方法

无论在有明海还是儿岛湾，滩板上都载有木桶与篓筐。乘者用手抓住这些东西，一只脚屈跪在滩板上，另一只脚则踩着脚板蹬泥行驶。蹬板的快慢根据每个人的熟练程度而定。在有明海，一蹬就可往前滑行6米许，可见行驶极快。其使用原则是滩板必须与木桶、篓筐配合使用。在膝盖跪于滩板的地方，放有用稻草做成的叫“胫助”（儿岛湾）、“垫膝”（有明海）的小圆座。由于通过场所的泥土所致，使滩板看上去似乎完全陷入泥滩滑行，但滩板并无在水上载人的能力。由于这个原因，在渡过海滩地带的江湖及水路时，人要乘木桶泅渡而过。

四、有明海的滩板状况

有明海一般都是浅海，沿岸的平均潮差为2米~2.5米，退潮时便显露出宽广的干滩。其干滩在以大牟田市尖端为界的东南沿海到熊本县长洲、宇土半岛北岸的有明海中央部分叫混合水

带。它们在退潮时是沙状干滩，涨潮时又变为一片澄澈的海面。但在西北侧沿岸福冈县、佐贺县尖端的筑后川河口、六角川河口、鹰岛市尖端、藤津郡太良镇破浪浦与谏早湾（泉水海）及长崎县的小长井、汤江、小江、本明河河口，从爱野地峡颈部渡过三岛到南高来郡（旧）的山田村尖端地区，海湾深处叫作湾内水带。它们在涨潮时是泥海，退潮时沿岸便呈现出堆积着黑色泥土的泥状干滩，即所谓的海滩地带。顺便说一下，有明海的面积为52.47万平方米，干滩为32.7294万平方米。使用滩板的区域与此干滩面积（湾内水带、还有前海）大致相同。在我所调查过的地区，使用滩板的范围以大牟田市的黑崎到有明海东岸为界。从那里开始，尽管多少有些差别，但滩板在佐贺县沿岸、鹿岛市尖端直到太良镇破浪浦都被广为使用。并且，一旦绕过岩礁上肥前大浦的竹崎岛进入长崎县，在谏早湾沿岸靠近小长井的爱野地峡三岛附近的地区亦被使用。在岛原半岛上，没有人使用滩板。考察一下有关滩板的称呼，可知它在福冈县黑崎、柳川市冲端、两开叫做跳板，在佐贺县叫滩板、推板、踢板、滑板、跳板，在谏早湾叫做跳板。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跳板是其通称。载于滩板上的木桶，在福冈、佐贺、长崎县通称为滩桶、推桶，在佐贺县部分地区和谏早湾也叫做半块木、版木。桶一般用杉木制成，直径二尺，深约一尺，有两个地方套有竹箍。在佐贺县以下地区，把乘滩板者称为滩夫、板夫，特别是在（旧）七浦村称其为爬夫，好像是爬着走的人的意思。在谏早湾，把曲跪于滩板上滑行的状态叫“蹴”。

五、儿岛的滩板状况

调查儿岛上滩板的分布情况，可知在呈袋状的内湾沿岸与平井、青江、抹尾、滩崎、八浜、郡、北浦一带滩板都被普遍使用。儿岛在宽文年间尚为14870平方米宽的海湾。在大正四年，海湾变成了一片东西长 12899 米、南北长9326米、退潮时全部干枯的海滩。湾内的涨退潮差一般认为有2.5米。特别是在处于内湾地区的妹尾与八浜的大崎，滩板广为使用。据说，因居住在湾内地区的八浜、妹尾的人们常常随着潮水的或满或干而进行捕捞，所以，滩板在妹尾亦广为使用。在进行开拓事业之前，据说还以此滑行到9750米外的八浜。但是，在北浦等位于儿鹿岛颈部的干滩，由于干滩稀少，使用滩板的范围也就有限。在旭川河口的高岛附近，由于干滩均为沙洲，滩板也就不太被使用。关于其名称，一般叫滩板，但也被称为冲板、矶板、滑板。把滩板上配合使用的木桶称为竹笼，把滑行状态称为蹬啦、踢啦、滑行等。用此滩板进行捕捞的情况在渔业文献上写为 “押板”、“滩渔”、“干滩渔业”，其渔业者叫做“海滩渔夫”。但自1956年2月实行儿岛湾淡水化后，海潮涨退消失，捕捞形式变成了橡木捕渔[①]、屋井床捕渔[②]。古志的滩板捕捞形式终于随之消失。

①② 均为冈山县田儿岛刷湾等地区的捕鱼业。它们的特点是利用早晚潮汐的涨退而进行捕捞——译注

六、滩板的捕捞方法

因滩板是为进行捕捞而使用的工具，所以它并不是所谓的渔具，可以说是近乎于舟船之类的工具。乘者只是一人，除了捕捞外，滩板几乎不能用于其他搬运、交通等。还有，除了运送在海滩上采集到的水产物之外，它不能运送很重的物品。使用滩板不限于男女老少，也不存在什么习惯的制约。无论在有明海还是在儿岛湾，使用滩板的渔业者把滩板主要用于寻找副食、汤料等农家副业的渔业。在儿岛湾的妹尾也好，在有明海的大牟田市黑崎、柳川市两开、佐贺县鹿岛市附近地区、长崎县谏早市附近地区也好，那些被称为滩渔夫、滩夫、爬夫的人，确实都是从事主农副业性渔业者。在有明海柳川市冲端、佐贺县诶早市南川副镇犬井道、长崎县诶早市的本明川河口等有很多专业渔民的地方，好像很少有滩板为主要从事渔业生产的人所使用的情况。在八岛湾八浜、甲浦（北浦、郡）等地的专业渔民中情况好像也是同样的。在青江，渔夫是地道的捕鱼者，干滩夫则是兼营农业生产的人。然而，无论是在现在的有明海，还是在儿岛湾沿海的渔民中，不兼营农业生产的人是很少的。判定其主农副渔，还是副农主渔是对应于其经济条件的时序性变化而不断变化来说的（据说，1958年有明海的渔民为1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兼营农业者，儿岛湾在1956年时据说渔民为2300人，专业渔民200人）。但是，在这两个地区同样用滩板进行捕捞的渔业者，已经根据现行渔业法加入了当地的渔业协同组织。如果那样做，他们就能行使共同渔

业权、区域渔业权。用滩板捕捞当然以生息在干滩地带的水生物为主要对象。在有明海，最有名的是渔者乘着滩板钓鲮五郎（生于有明海干滩，属虾虎鱼类），即用类似于大钓钩的东西钓起有明海的名物鲮五郎，以此作为滩板捕捞的主要内容。除此以外，还捕捉鳝鱼、鲝虎，采集贝类及海笋、江珧、蛏、牡蛎。在儿岛湾的海滩上，主要是捕捉鳝鱼、虾蛄。鳝鱼用栅栏挂取，而虾蛄则用一种叫踏虾蛄的方法捕捉。其具体方法是：如泥中有两个虾蛄洞，就用滩板压于其中一个洞上，用手捉拿从另一洞里爬出的虾蛄。因此，滩板在八浜镇大崎一带极多。在儿岛湾，滩板用于采集贝类中的藻贝、灰贝、镇台贝（于明治时代从有明海移进的蛏）、牡蛎（多有养殖）。采集贝类叫做“抽取”，其方法是把手插入贝类栖居的洞穴中捉取。除此之外，还用叫做“押板”的方法进行采集，并把采到的幼小灰贝卖给其他地方的养殖业者。六七十年代前就有以此为业者，它曾相当发达。这种做法就是把叫做灰贝耙子的工具放在干滩上，单独站在滩板侧面的人进入泥中推拉并用金属或者是扁柏做成的耙子采集灰贝。一般认为，这是繁重的劳动，真正的渔夫似乎不太做这些事。这些水产物的收获时间，无论在有明海还是在儿岛湾，主要是春、夏、秋这三个温暖的季节。

七、有关滩板的习俗

有关滩板的传承，目前几乎已经不存在了。不管是在有明海，还是在儿岛湾都没有收集到关于滩板制作之方法、起源、特

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